

474084

台港及海外中文
报刊资料专辑

第 1 辑

111-7

政治研究

台湾

32.2097
JXF
1987.1



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说明

由于我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广大科学研究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党、政有关领导机关,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动态。为此,本中心编辑《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专辑所收的资料,系按专题选编,照原报刊版面影印。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一般不作改动(如有改动,当予注明),仅于每期编有目次,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以资查阅;必要时附“编后记”,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对于反对我四项基本原则,对我国内情况进行捏造、歪曲或对我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概不收录。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甚至对立,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对此,我们不急于置评,相信读者会予注意,能够鉴别。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我国”、“中华民国”、“中央”之类的文字,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国民党中央而言,不再一一注明,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为了统一装订规格,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即封面倒装。

本专辑的编印,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限于内部发行。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管理,慎勿丢失。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

台湾政治研究 (1)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1987)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编辑

季啸风 李文博主编

文 文 选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七号)

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4½ 印张 115 千字

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ISBN 7-5013-0052-6/D·7

(书号 3201·67) 定价 1.30元

〔内部发行〕

目 次

台湾政局

台湾政局随时有变——蒋经国不放心陈履

安、郝柏村

现阶段与台湾未来的政局

展望未来国际局势与台湾前途

揭开蒋二公子“下西洋”之谜

台湾党内外方

台湾党内党外矛盾不断升级

国民党为什么与党外“沟通”？

民主自由统一中国

国民党三中全会传达了什么信息？

蒋经国的一著棋

举足轻重的新强人，蒋纬国

蒋纬国能经天纬地吗？

蒋纬国秘史大公开

蒋纬国年谱

两航谈判

“华航事件”后的台湾时局

在台湾看“两航”谈判

“华航”内幕

另一场“华航”争夺战

秘闻、丑闻

蒋孝武神秘夫人之谜

“南园惊梦”——记《联合报》的“国建会”

丑闻不断的台北之狐，高玉树

台湾外交

发展实质外交，增进国际关系

未来十年中华民国与美国之关系

台湾未来十年对外关系的展望

“民主回归派”与“统派”

台中人 1

田弘茂 5

熊玠 7

石 蘊 10

马 克 12

卢张东夫 15

马 克 17

马 克 21

龙中天 24

龙 心 28

蒋纬国口述 孙淡宁执笔 32

集 之 38

马 克 41

骆凤山 45

李竞生 47

林 标 49

路 榕 54

蒋良任 55

公孙叔 61

林 东 20

丘宏达 63

蔡政文 66

艾 凡 69

台灣政局隨時有變

蔣經國不放心陳履安、郝柏村

□ 台中人

今年三月，台灣前副總統陳誠兒子陳履安入選國民黨中央常委，評論家都說，這反映出陳誠的餘蔭尚在。

陳誠餘蔭仍在，蔣經國不放心

陳履安進入國民黨中常委是不簡單的。表面上，他是接閻振興（前台灣大學校長，負責科技方面的黨務）的棒，但實際上，科技界代表進入國民黨中常委非屬必要，閻振興的資望亦非陳履安可比，故陳履安的得以晉身，在於他是陳誠之後應為主要因素。陳誠生前長期任台灣省主席、副總統。陳誠舊部親信，滿佈台灣各地，在蔣經國接班問題上，陳履安是關鍵人物之一。

陳誠過去有一段經歷，曾經使到蔣經國一直困擾和猜疑，台灣方面一位分析家說：蔣經國的任命為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前瞻性」因素很多，其中監察陳誠餘蔭的發展，也是原因之一。

這話怎麼說，且聽我慢慢道來：

美國秘密檔案的公開

一九四八、四九年，中共軍隊席捲大陸，這段時期，用蔣經國的話來說，是蔣家的「危急存亡之秋」。四九年以後，更被迫要撤退到台灣去。

由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起，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就不斷討論如何分離台灣與中國的問題及計劃。我們由美國「國家檔案局」已公開的檔案，可看出：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NSC檔案第三十七號：「台灣、澎湖各島之形勢，關係日本與馬來半島之航路，亦控制菲律賓與琉球之交通，如果台灣落於不友好國家之手（指中共與蘇聯），美國在這東地位將受嚴重損害。故美國無論如何，應不惜一切方法，使其長屬對美友好之政權。」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NSC檔案第三十九號：

「美國亦宜扶植台灣自主分子，俾其發動台灣獨立時，可合美國之利益。」

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 NSC第三十七號之五文件：「聯合軍事參謀首長會議所擬：『派艦巡邏及駐泊台灣港口』之辦法，既不足杜絕共產黨之滲透，又妨及以政治或外交方法保全台灣之措施，不宜辦理。如對台灣必須使用兵力，則宜由多數國家共同出面參與，或由聯合國出面，交由台灣民族自決。」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九）R，檔案：「台灣人民對政府誠有不滿之情界，但台灣無堅實之組織與共戴之領袖，不足以成大事。是則欲使台灣免入共產黨之手，惟有向聯合國要求託管之一法。」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處」檔案：「非正式向菲律賓、澳洲及印度各政府，探詢改換台灣、中國政權之意見」，包括理由和方法，及美國不使自己出面之隱情」（「台灣意見書」A條）而後有：菲律賓外長羅基洛在聯合國安理會演說：「……由摩文敦博士所領導的台灣獨立運動……台灣雖無立國的條件，已具立國的意識……」。

美國游說陳誠在台灣「自立」

美國為了「台灣如何符合美國之利益」，除了作上舉各種密謀設計和討論外，並派遣當時駐中國大使館參事莫成德（Livingston T. Merchant）為密使，在台灣游說台灣省主席陳誠「自立」。莫成德是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自南京飛台北的，他和陳誠所談的內容，是要求陳誠順從美國的主張，這份資料現在也已經公開來了，當中包括：

(1)台灣現在的省主席，宜使政治與國府分離、經濟貿易和中共絕緣。台灣主席辦理台政，美國每年撥給台灣經援二千五百萬美元。

(2)形式上，連絡菲律賓、澳洲、印度、巴基斯坦、錫蘭（即今斯里蘭卡）各處，各出一些象徵性的兵力，會同美軍佔領台灣。希望在兩週之內，在台召開政權轉移會議，蘇聯、中國國民政府亦可參加。

(3)會議決定後，美國即對台灣海峽之海上及空中擔任巡邏與聯繫之活動，以免外來軍隊之來襲；同時遣送不受歡迎之大陸在台分子。

(4)通知蔣介石，如他願留台灣，當以政治避難者之身分相待。

(5)邀請孫立人參加台灣新政權。

(莫、陳密談，見梁敬錚博士作：《卡特「中國牌」政策之歷史背景》一文。)

陳誠態度猶豫

陳誠在此一時間的徬徨搖動是可以想見的，他誠然眩於權力誘惑，而對蔣介石這位「故主」，他必須採取什麼態度去相對，當時似乎也頗感踟躕。我們如參看蔣經國著的《風雨生信心》第二章〈危急存亡之秋〉——他所公佈的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日記，有關蔣介石來台經過各條，就可以看出一些蹤跡：

五月十六日：「……父親下午在金門南岸……準備明日赴馬公島，但 父親表示甚願在定海與普陀作常駐之計也。」（可見蔣介石對是否來台，尚未決定。）

五月十七日：「……午餐後，隨父親由江靜輪登岸，一時半起飛。沿途俯瞰三門灣、海門、樂清……四時五十分飛抵馬公降落，父親即至馬公城外之賓館駐節，此島實一平灘，並無山地，氣候頗熱。

……此時中樞無主，江南半壁，業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父親決計去台，重振革命大業……」

蔣介石不逕飛台北，還是摸陳誠心意

蔣既「決計去台」，為何不逕飛台北？而在馬公駐節？因他要看看作東道主的陳誠的態度，而定行止。果然，再過四天，陳誠去了馬公看蔣介石，蔣經國日記記得很簡單：

五月二十一日：「陳辭修、俞鴻鈞、蔣銘三（鼎文）三先生來馬公，晉謁 父親。下午往機場送辭修先生返台。

再五天後的日記：

五月二十六日：「父親於今日自馬公飛岡山轉高雄壽山。」

為什麼蔣介石來台灣了，他不逕飛台北？而却飛岡山轉高雄？日記上也沒有寫陳誠有沒有去接？這一

疑團，我們在《吳國楨八十憶往》一文中，可看出端倪和未為人知的秘辛。茲轉引如下：

「一九四九年五月，蔣先生自舟山致電陳誠，告有赴台之行。陳在二十四小時內未行覆電，蔣只好改從高雄登岸，因高雄市非陳的勢力範圍。孫立人、彭孟緝等往迎，蔣介石劈頭第一句話：『我在此地安全嗎？』孫立人回答：『由我們保護，有什麼不安全？』」



◀陳誠雖已病逝多年，其在台灣勢力仍不容忽視。



◀陳履安是陳誠兒子。年邁多病的蔣經國，在接班問題上，對陳誠的勢力並不放心。

由此可見，此時掌握台灣實權的陳誠，在美國的高壓和誘惑下，在國軍在大陸兵敗如山倒的衝擊下，他的取向是在未知之數。在這五天前，他和俞鴻鈞、蔣鼎文三人飛馬公去見蔣，當天下午就單獨由馬公飛返台北。蔣經國日記僅寥寥數語，自有隱諱，所隱諱的，在《吳國楨八十憶往》中，也多少可以找到答案的眉目。因之，以後蔣經國來台的初期歲月中，就有全天候二十四小時「被監視的時代」。監視他的，就是陳誠。

全天候二十四小時監視蔣經國

蔣經國是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左右來台，至一九五〇年三月以前都無官無職，僅以國民黨蔣總裁哲嗣的身分，為自己的父親供奔走、作代表。居處又不和蔣介石在一起，出入自宅與官邸的行動自更頻繁。而當時跟從者的任務，既為精密的紀錄下：蔣經國在台期間，每一天有些什麼人到他的四條通寓所看他？他曾與什麼人一道同行出入四條通寓所？他有沒有帶領什麼人到官邸謁見蔣介石？透過他的關係而與蔣介石見面的人背景是什麼？意圖是什麼？等等，都在蒐集之列。因此，跟從的保防組員，有兩個小組，每個小組各若干人，化裝成三輪車伕，成為四條通和官邸附近「三輪車班頭」的車伕；總之，每天二十四小時，這兩個班頭中的三輪車伕，在同一時間之中，至少有二名是堅守在班頭的崗位上；此外，三分局（現中山警察分局）巡邏四條通的員警和刑警，也是組上的自己人；賣饅頭飽、燒肉糰、枝仔冰等等在四條通附近穿梭叫賣的流動攤販，也不少是個「組」的自己人或運用的線民，加上電話的注意情況就幾乎可以把握到百分之六七十。

從石鳳翔到蔣渭川

此時，我曾因「中間」的職務關係，看到其中一個「個案」的案例：先是在四條通跟從的人員發現石鳳翔（蔣緯國元配夫人石靜宜的父親）經常往四條通蔣公館跑，於是即在石鳳翔私用電話秘密接線監聽，進而知道台灣「二二八」事件首要分子蔣渭川（曾在「二二八」事件爆發時，佔領設立在介壽路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向全省及向全國作廣播，宣稱「台灣獨立」的人。此時蔣渭川仍在通緝之中）透過

住在香港的國民黨元老、曾任粵軍總司令的許崇智的關係，欲向蔣介石親自表示自新之意。由電話內容的了解，是許丙（林本源堂的管家，受日據總督府特別培植，做到日本「貴族院」議員，並為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的「帝室囑託」，為當時台灣籍人士中見過世面最多的一位政客，「二二八」事件，亦為涉案之一人，此時亦在通緝之列），此時他以姓「許」同宗為名，搭上了許崇智關係，許崇智乃要石鳳翔居中奔走，透過蔣經國的管道，帶蔣渭川去見蔣介石。

於是經由對石鳳翔電話的監聽，也清理出了許丙、蔣渭川所在的電話號碼，如是三四方向的監聽，連蔣渭川在見蔣介石時曾痛哭流涕表示悔罪，蔣表示不追究，准其自新，安排他出任台灣省民政廳長，蔣渭川感激涕零表示：「決以贖罪之身為國賣力，決號召台灣青年六十萬人從軍報國」等等訊息，都在監聽電話獲得的資料之中，互相參證整理出一個完整的輪廓。經過主辦參謀的研判之後，馬不停蹄的親自送台幫保安司令部二科科長核稿、處長核稿、參謀長核稿，副司令核示：即時繕呈長官。這一案例，算是對蔣經國保護監測大約一年時間許許多多案例中的一個頗具代表性的「個案」抽樣。

風雲莫測，深恐禍起蕭牆

當時我因工作關係，看到這一保護蔣經國的原卷，包括：情報來源（當時外勤諜報員與內勤主辦參謀之間通訊，均使用化名，而且化名時時更換，所以絕對無法從情報文件上知道是什麼人在辦這一個案，是什麼人所報的。），參謀研判，科長核稿，處長核稿，參謀長核稿，副司令判示：「即刻繕呈長官」，使我感到玄妙！我想到：蔣經國以「最高領袖」的哲嗣身份隨同蔣介石在台灣，其行動受到如此嚴密的防範，為什麼？在當時，蔣經國如果有超越上述「個案」的情報出現，將發生怎麼樣的不可測變化，亦未可知。一有異變，那一九五〇年以後的台灣歷史，都可能改觀了。今天，我把這一段歷史寫出來，回想現任陸軍一級上將彭孟緝（他是當時保安司令部最高負責人）、當時保安處少將處長林秀榮（後曾昇任國防部動員局中將局長，現已退休）、當時保安處第二科上校科長李葆初（後曾昇任保安處少將副處長、外調為台灣省警務處刑警總隊長，現已退休），當時亦都是執其事者，相信他們應都不會否認有過這麼一段歷史事實的。



◀ 郝柏村（左一）垂頭喪氣，蔣經國最近一舉削弱了「郝家班」。

陳誠中計，岡山一役， 親信將領從此永世不得翻身

到了五十年代末期，却發生意料不到的另一事件。蔣介石自1954年連任總統後，隨即面臨「憲法」第四十七條「總統」只得連任「一次」的限制。因此蔣介石是否會修改憲法，以遂再次連任總統之志，遂成爲了各方矚目的焦點。

1958年12月23日，蔣介石以「總統」和黨總裁的雙重身份，用斬釘截鐵、信誓旦旦的語氣公開宣佈：

「我可以代表中國國民黨，代表政府來說，我們不僅是沒有修改憲法的意思，並且反對修改憲法。」

蔣介石這個「保護憲法」、「不修憲」的主張，在當時台灣內外，一致解釋爲不再連任。而從台灣的「憲法」規定來看，這的確也是當然的解釋。蔣介石當時這番表態，立即獲得國內外的熱烈反響。場面就有如去年蔣經國兩度談話，聲明無意由蔣家人繼任「總統」，權力亦不會轉移給蔣家子弟一樣熱烈。不過，這次人們學乖了，只是「等於瞧」。

五十年代末期，那時陳誠是副總統，是台灣第二號人物（聲望實力遠超今日的李登輝），繼任總統自不作第二人想。因此，陳誠便在岡山召集親信軍事將領，密商接班佈局。很不幸，這些舉動早已被監視，商討內容且被全部錄音，支持陳誠的將領不明政壇險惡，此後便不得翻身。觀乎陳誠的例子，觀乎蔣緯國的安排，因此台灣政壇人士普遍認爲，蔣經國不傳子

弟的聲明，只是試探皮球！

台局的錯綜複雜，派系之多，或者就像汪精衛說過的：「胡展堂（漢民）真天真得可愛，說出『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話，要知道中國人只要有三人在一起，就會分成兩派的」。這一句話，正是台灣當前局勢的註腳。

陳誠死，蔣經國放下心頭大石

陳誠年輕於蔣介石十六歲，他當時自然不可能想到，他竟比蔣介石提早十年又一個月，於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就逝世了。

陳誠臥病以來，蔣經國曾多次探過他，陳誠早逝，這對蔣經國來說，至少解除了心理上的一大壓力。

蔣經國有數不盡的擔憂

如今蔣經國正在走向他生命的最後一程。風雲難測，禍起蕭牆，誰能預計有什麼事情不會發生！任用蔣緯國出任安全會議秘書長，一旦有什麼「不安全」的事件發生，自可臨危應變，挽救一切。從宋長志調職，汪道淵出掌國防部，鄒堅外放南韓，一步步削弱軍事強人郝柏村的羽翼，以防南韓軍事政變式事件重演，事實已經很明顯的了。但是，陳誠餘蔭仍在，實力不少，所以蔣緯國這次的授命，對陳誠舊系和陳履安的冒升，實亦有防備作用，回顧歷史看這一點，也就可以看得比較明顯了。

（原載：《角鏡（港）》1986年166期46—49頁）

現階段與台灣未來的政局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田弘茂

台灣《夏潮論壇》編者按：

維繫台灣存亡的中美關係在未來的三、五年內將有大的轉折，《聯合報》系因此邀集海內外學人於去年底在《南園》開了一次討論會，題目為「國家未來十年發展的探討」，據說因為頗涉敏感問題，所以內容並不對外公開，本刊為照顧讀者知的權利，特將較能反映形勢的數篇論文節錄刊出，以饗讀者。

最後，我們要感謝《八十年代》的江春男先生，站在雜誌同業和關心台灣前途的立場，大公無私的提供了這批論文，否則我們是無由刊出與讀者見面的。當然，我們更要感謝這批論文的作者，他們站在學術立場為台灣前途所做出的努力。

協防條約終止 台海局面改觀

求生存是任何國家、任何政權的最基本要求，中華民國自非例外。國府遷台以來，一直受到中共之軍事威脅。韓戰爆發後，中美簽訂軍事協防條約，台灣在美國戰略防禦體系之下，國防安全提高，維持了十八年相當穩定的局面。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美斷交，翌年終止協防條約，台海軍事局面改觀，此後國府必須單獨承擔國防安全之所需。在此重要的轉變關鍵，中共訂定了對台「和平統一」的政策，暫時排除以武力解決統一問題。

中共過去曾經一再宣稱，要以武力「解放台灣」。一九七八年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釐定以「和平」方式達成統一，拋棄了所謂解放路線。當然這是鄧小平等改革派，在奪權過程，一方面為了配合大陸現代化路線，迫於形勢所採取的一種策略轉變，目的未變，只變策略。隨後，葉劍英、鄧小平、胡耀邦，與鄧穎超等連續發表有關「和平統一」的談話，並由葉、鄧先後提出所謂「和平統一」的「九點方案」與「六點補充」。去年中（共）英完成香港協議，中共更積極推銷其「一國兩制」模式，把上述的「九點方案」與「六點補充」列入「一國兩制」的和談架構。

中共所提出的這些架構與條件，是所有當權人物共同協議所提出來的主張，無論今後由誰主政，基本

構想不太可能改變，其尋求台海兩岸統一的最後目標，已是既定國策。將來可能修改的，屬於策略層次和時間表，而「和平統一」與否，則屬於策略問題。

胡蘿蔔與棍棒， 軟硬兼施

在「和平統一」與「一國兩制」的架構之下，中共近年來積極地採取一連串的統戰攻勢，以「胡蘿蔔與大棒」軟硬兼施，向國民黨迫和。在國際社會中，中共竭力孤立國民政府，試圖製造中華民國無地自容的絕境。在高談「和平」聲中，却處處擺出「不排除武力途徑」的姿態。去年鄧小平向日本記者正式提出封鎖台灣之語，今年胡耀邦又向紐約華報記者闡述「動武」的構想，津津樂道。十月中，中共從旅順大連外海向距離基隆僅三百公里的釣魚台海域試射中程飛彈，藉以證明鄧小平要封鎖台灣之語，是有力量辦到的。

這一連串的事件，顯然是出於北京當局有計劃的恫嚇姿態，暗示和談不成，中共必訴諸武力並有能力去做。但以中共的內外形勢來說，在未來十年內不至於採取強制力，策略重點還會繼續擺在「和平統一」運動的統戰策略上。不致動武（實際上封鎖也屬於另一形式的動武），基本理由至少有下列四端：

統一與現代化， 中共的魚與熊掌

一、中共有意把收歸香港的「一國兩制」模式應用到台灣。「九七」大限距今尚有十二年，從北京立場觀之，收歸的過程能越順利越好，對台動武將震撼港人民心、破壞香港經濟，嚴重地影響了收復香港的工作。

二、現階段的中美實質關係尚佳。台灣關係法表示美國對台海局勢的關切，中共一旦發動台海戰事，沒有把握華府會袖手旁觀。因此，美國可能干預，便成為重要的阻遏因素。

三、經濟現代化與「統一」同屬中共當前的兩大

國策，在優先次序上居同等地位。以武力謀求統一，將嚴重地打擊經濟現代化措施，必然要付出的代價包括：耗費有限的寶貴資源、外資與外債大幅減少、大陸經濟投資轉入國防工業與軍備等等。任何當權者也深怕，一旦發動戰爭，並無法急速制勝，戰局一拖延下去，對其至其中任何一位產生不可預測的結果。

四、十年內中共完全沒有把握能夠以一般武器取勝。蓋掌握台海制空權與制海權的絕對優勢，不易辦到。中共在動員武力時，更必須兼顧中蘇與中越邊防駐軍問題，分散軍力。發動核武攻擊是不可思議的事。台灣若成廢墟，征服後無多大價值，反而徒增甚多的麻煩。

除此之外，中共又必須考慮國際間的負面反應，尤其亞洲鄰國將因而產生戒懼心理，疏離中共，使中共在區域性的國際政治上陷於難以化解的僵局。台灣居民對中共所產生的敵意，即使在「統一」之後，也不易收拾。

假定中共當權者完全以理性的態度處理「統一」問題，把動武所涉及的代價與效果詳加權衡，便會發現對台動武是得不償失的作法。因此，在「九七」大限之前，採取任何形式的強制力，可能性不大。但還並不排除北京當局採取非理性的貿然措施，更未否定「九七」後訴諸於武力之可能性。我們姑且承認在現階段爆發台海戰事是不可思議的事，中共對台灣的威脅仍然不會因而化除。而非武力的統戰攻勢，對台灣生存與安定也會構成嚴重的挑戰。

中共近年來的外交和統戰工作，對台灣政治實體形成了重大壓力，已經收到相當成果。其比較具體的措施，至少有下列五種：

一、在外交上，把國民政府漸漸推向孤立無援的地步。北京一方面積極拉攏與台灣尚有邦交之國家（如烏拉圭、巴拿馬、南韓、沙烏地阿拉伯與梵蒂岡），另一方面則致力清除台灣在官方國際組織之會員籍。其意旨不外是要打擊中華民國的主權地位，使中華民國由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變成缺乏國家人格的地區，在國際社會中難以立足。其影響所及，連台灣的外貿與其他對外商務活動，都受到廣泛的困擾。

台灣內政是否民主， 關係美國的支持

二、不斷地向美國施壓，以期終止美國對台軍售，甚至廢止或刪改《台灣關係法》。中共策略能否進一步收效，與下列幾點關係密切：(1)美蘇關係是否會有實質的改善。雙方關係處於交惡狀態，中共便能維持甚至提高其在三角關係中的戰略地位。反之，則其討

價還價的籌碼，自然因而減低；(2)改革派是否繼續主政，改革路線是否持續不變。有則中(共)美關係會不斷地改善，美國決策者對「綠化中國大陸」進一步寄予厚望，無則關係倒退，對台灣有利；(3)美國朝野支持台灣的決心與力量多大。雙方的經濟利害關係是考慮因素，但台灣內政是否安全與民主，也會助長或喪失美國友人的支持；(4)美國總統與國會的意向。列根總統主政之日，加上目前的國會權力結構，尚有利於維持中美關係之現狀。但四年後總統易人，國會成員大幅更動，屆時美國政府的政策意向，就很難預期。

經濟利益的誘惑 與民族感情 的激發雙管齊下

三、推動台海兩岸經濟掛鉤。具體作法是鼓勵通商，使台灣經濟一步一步地依賴大陸原料與市場，造成欲罷不能的形勢。台灣的外貿導向經濟面臨亞洲低工資國家的激烈競爭，又遭遇工業國家正在崛起的保護主義的抵制，這些外緣因素加上內發的結構性與政策問題，陷入轉型期的困局。中共有鑑於此，大力提供通商誘因，並製造有催化通商作用的輿論，以期相輔相成。

四、以「民族統一」、「振興中華」的口號，試圖吸取海外臺灣僑胞份在台居民的「歸心」。現代中國人所具有的「大中華主義」潛意識，有利於中共的煽惑。北京當局的作法是積極地鼓勵並安排海外華人（甚至包括中央研究院院士們和親國府各界）以講學、開會、探親、研究、通商、旅遊、投資、帶學生實地學習、送第二代去學習華語等方式，不斷地訪問大陸，以激發民族感情上的認同感，從而瓦解國府在僑界的向心力。

不用一兵一卒， 還是步步進迫

五、多方面接觸海外台籍人士與社團，利用許多人的不滿情緒，進行游說疏通。近年來，中共已經在海外台籍社會中建立溝通或滲透據點，若干社團已和中共的外圍組織產生聯繫關係，下一步可能是相互掛鉤。海外台籍社團與國府間的一些嫌隙，係中共統戰想乘機利用的客觀形勢。

以上種種，可見中共即使不對台用一兵一卒，却一步一步地造成對國民政府極其不利的政治外交局面。政府要突破，必須要採取新作風，並作人事上的調整。

（轉載自台灣《夏潮論壇》86年2月號）

（原載：《廣角鏡（港）》1986年162期56—57頁）

展望未來國際局勢 與台灣前途

□（美國紐約大學教授）：熊玠

美國大戰略之下的 大陸與台灣

要了解美國對華政策，必須了解美國二次大戰以來對全球之戰略考慮。在這全球戰略中，美國之利益乃在保衛早在一九四〇年初史畢克（Nicholas Spykyman）教授所定名之「大地緣之兩端」（The Rimlands）——即西歐與東亞——以抵制跨歐、亞之「軸心強權」，即今日之蘇聯。（此「軸心強權」Heartland Power觀念始自英國地緣政治家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斯福總統刻畫中國在戰後扮演「東亞區域之穩定力量」，完全符合「大地緣」策略之構想。唯除防俄外，還須加防範日本軍國主義復甦之任務。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淪陷共黨之手，摧毀了美國對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戰略計劃。中共被視為是史太林統治下蘇俄共黨帝國之延長。由於「大地緣」之東端（中國大陸）失守，美國只好尋找「代替品」。於是日本必須由戰敗屈辱地位助其重新擡頭。美國駐日之基地，再加南韓，及中華民國退守之台灣乃造成一防堵共產世界東翼之屏風。

中共——從圍堵到拉攏 台灣——從盟友到絆腳石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歷史對美國東亞政策有幾大諷刺。第一，本來期望與中國（中華民國）共同看守之戰敗日本，不數年遂為美國親手扶植成盟邦，以對付強佔中國大陸之共產政權。第二，本來認為是蘇聯傀儡之中共政權，却於一九六三年正式與莫斯科決裂。由於此變化，美國在一九五〇年代圍堵中共之部署，均失去其原意，而導致尼克遜與基辛格以來之玩「中共牌」政策，由原先仇視中共而轉變到向中共親善。第三，中華民國之台灣，自韓戰爆發以後即成為美國所領導自由世界陣營之忠實盟友。但美國在一九七〇

年代有玩「中共牌」需要時，台灣這個原先的盟友反而變成一個「絆腳石」。另外還有一諷刺，就是美國一九七〇年代末到一九八〇年代初玩中共牌之最大假定是：中共與蘇共之鬥狠是無法彌補的。在前面第（一）節，我們已經看到這個假定在今天已甚難維持。不久，美國又須摸索一個較切實際之對華政策以代替「中共牌」政策。在討論此點以前，讓我們先看一下美國自與中共「正常化」關係後，其對台灣看法上之演變。

《上海公報》—— 一切變化的開始

美國對台灣之看法，自一九七二年《上海公報》以來，有幾個不明顯而極重要之轉變。首先，在《上海公報》中，美方（由於尼克遜總統親自修改）故世措辭曖昧。在美方片面宣稱有關「只有一個中國」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時，故世冠以「美方認識到」（acknowledge）此為「台灣海峽所有中國人」所「維持」（maintain）之立場，並加稱「美國對此立場不加質疑」（以上為我個人按英文翻譯）。其曖昧之處乃：（1）美國並未主張一立場，僅「認識到」兩岸中國人之立場；（2）如果兩岸有一方面中國人改變態度，則此「一個中國」之立場將不成立，而美國同樣不至於對之加以「質疑」。此為尼克遜暗藏之玄機。

「建交公報」—— 形式上的承認

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建交公報，美國比較更接近中共之立場，內稱「美國政府認識到中國人有關只有一個中國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之立場。」這裏的「中國人」為何？此句之前有「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之宣稱。顯然此處「中國人」立場是與中共政權所代表之「中國」有關。原來《上海公報》中尼克遜所暗藏之玄機，已被卡特放

棄。

「八一七公報」—— 實質上的承認

等到列根一九八二年所簽之「八一七」公報，更明顯地接受了中共之立場。該公報第五段宣稱：「美國政府……重申無任何用意要侵犯中國之主權及領土完整，或干預中國之內政，甚或推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之政策」。而在此段之前一段有言：「中國政府重申台灣問題是中國之內政」問題。前後一道看，美國在此公報中顯然接受了中共之立場（即台灣問題是中共統治下「中國之內政」）。列根政府在此後之解釋曾強調兩點：（a）美國執行「八一七」公報，將須遵循美國國會在一九七九制定之「台灣關係法」；（b）中共尋求對台灣問題解決辦法必須是和平的。雖然如此，事實仍然是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更進一步接受了中共之立場。假如卡特放棄了尼克遜在上海公報中暗藏之玄機，列根在「八一七」公報中正式地駁斥了此玄機。

美國支持台灣與中共達成 「自願而有利」之協議

更值得中華民國注意的是本年列根政府之所動向。中共在其「獨立外交」之下開始與蘇聯和解（見前），顯然讓列根政府深感不安。今年十月布殊副總統訪問大陸，雖是跟中共紡織品輸美及其他「俗事」有關，但骨子裏未嘗不是要趁機摸清中共之底蘊。在布殊未到之前與在北京訪問期間，中共一再表示美國與台灣之關係是改進美國與中共間關係之「障礙」。布殊事後對美國記者之公開報導是：他曾正告中共領導人，美國政府在台灣問題解決上無法作一「催化劑」。實際他在幕後說了什麼當然不得而知，我們僅能從旁證來推測。正當布殊在北京訪問之時，十月十五日國防部長溫伯格在華盛頓一項透過人造衛星進行之記者招待會中發表一項引人矚目的話。在回答一位新加坡記者之發問，溫伯格說美國支持台灣與中共之間達成「對彼此有利而出於自願」之協議。他強調此種協議必須由諸台灣之「自願」並且對雙方（即大陸與台灣）都有利。過去美國政府對於中共「統一」願望，最多僅說這是須由中國人自己去解決。最多亦不過說中共尋找「統一」之途徑與結論必須是「和平的」。如今溫伯格不單提到台海兩岸以「協議」解決，還表明何種協議將受美國支持。說話的時間，也好像在為布殊解圍，甚或是配合布殊在北京訪問之需要。

美國將協助擴大雙方接觸 的基礎，俾兩岸進行對話

另外十月廿六日在紐約市一項亞洲討論會上，美國國務院協調台灣事務主管官員班立德（Mark S. Pratt）也做了些堪人尋味之談話，他強調「美國並不想讓台灣脫離中國，以使其成為不沈的航空母艦」。在談起「美國能做些什麼來幫助台灣和中國達到一項權宜性之解決方案（modus vivendi）」，班立德自我解答道：「美國通常回答說，它目前所做的正是為了達成此項目標，逐漸增加（台灣海峽兩邊）學者、科學家和技术人員在美國大學和國際會議上的接觸，擴大雙方貿易以及其他建立信心的措施，將可提供一個基礎，俾進行更多的接觸，最後也許可以在這基礎上進行對話。」班立德之論文雖是以個人身份提出，按常理是先經過國務院上級審閱過才能發表的。該文不但陳述美國對台灣政策，指出與中共在此問題上之歧見，並且在兩點上作了比美國過去官方立場更積極之論點：（1）過去美國官方僅對中國表示不預備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班立德之論文則認為美國甚至不會將台灣從「中國（共）」手中奪走。（2）過去美國政府僅希望台海兩岸中國人去尋求一和平解決。而班立德則不諱言地聲稱美國還可以在緩合台灣與大陸對話上扮演一適當角色。更值得吾人玩味的是：班氏之論文是以「台灣之前途」為題。

從消極的能推則推 到積極的有意緩合

總的來說，溫伯格與班立德之有關台灣前途論點，在表面上均未太脫離美國政府歷來之官方立場。套一句現成語，他們所言似乎僅做到「活學活用」之地步。但由於他們之談話，讓我們得到一個新的形象。前此在台灣問題解決上，美國政府是採一「能推則推」之姿態，而且是寧願站在幕後的。而今美國政府似已不再「推」了，似乎已有意由幕後走向前台來了，甚或有意扮演一「緩合」之角色。由消極而變為較更積極，溫伯格與班立德二人之談話是明的，由明推暗我們大概可以猜想到布殊副總統在北京說了些什麼。

以上所談美國在「台灣」問題（即中共所謂「統一」問題）上之逐漸演變，愈來愈傾向於中共之觀點。這也證實了自一九七〇年代底以來美國之對台灣（中華民國）政策，無寧是其對中共政策之一章節。由於此，我們在更深一層談台灣之前途，及我們因應對策之前，須要有系統地分析一下美國近十多年來對中共政策之理論基礎。簡言之，美國玩「中共牌」政策有

以下幾項理論上之假定，而其政策之可靠否，全看這些假定是否正確：

「中共牌」的遊戲規則

(1)第一項假定是中共與蘇聯鬥狠，是絕無挽回之餘地。此點是自尼克遜以來所有美國總統均篤信之一條。

(2)與此相關之一假定是：中共強足以用來抵制蘇聯，而弱不足以威脅美國。此點出自基辛格。

(3)假如要唆使中共專心一致對付他北邊之強敵，則其南邊之問題（譬如越戰、與台灣問題）美國必須幫助解決。此也是出自基辛格之原意。

(4)中共由於其「四個現代化」需要，必須依賴美國之友善及協助。此點可稱「科技衛星」假定，是卡特時代布列津斯基之傑作。

(5)如果由於美國之扶植，中共能與蘇聯抗衡時，它將永遠留在美國陣營。此亦出自布列津斯基之倡作。

在原先尼克遜與基辛格之設計中，介於中、蘇共之間美國將交替傾向一邊，然後再一邊，以求得到最高效果。實際上美國蘇聯與中共交往，而與蘇聯達到「低溫」，可是自卡特政府於一九七九年夏放棄原先之「等距政策」，而一面倒向中共以後，美國對蘇聯就喪失任何影響力。而美國與蘇聯之門關了以後，其能影響中共之力量亦大為削減。同樣的，列根總統在其第一任中毫無保留的反蘇，結果在盟邦（包括日本）及中共面前徒然失去其伸縮彈性。中共更因美國可代他反蘇，自身反而可跟蘇聯和好，誠已如上述。儘管如此，列根之對中共政策仍然脈承以上五項假定，且加了兩項。

(6)中共可以用美國武器武裝起來，去對抗蘇聯。萬一兩虎相鬥，則兩個共產政權俱受損，美國豈不坐享其成？此可稱為「中共卒」（即「過河卒」去拼死也）假定。

(7)中共在鄧小平與鄧派統治之下，有希望在用美國大量援助之下，使其脫離共產制度，此可稱「叛共」假定。

「中共牌」——不可靠的假設

以上七人假定，無一是踏實可靠的。由於篇幅關係，無法逐一舉例說明。我只想指出兩點原因，說明為何這七項假定均未能踏實可靠。第一，中、蘇共交惡能否彌補，是一個現實之問題，決定於他們自第二項至第七項假定，均須要中共完全瞭解不知之情況下方能兌現。如果中共察知被美國利用作反蘇之武器，被唆使專心去對付北邊之強敵，被製造成一科技衛星……則中共必會採取解脫之步驟。中共不願意依賴美

國過深，躊躇不願購美國軍火，及決定與蘇聯和解等等，均是中共針對美國玩「中共牌」之對策。此所以美國「中共牌」計策終不得逞也。

綜上觀之，美國玩「中共牌」不得逞，吾人得兩項啓示：第一，美國自尼克遜總統以來，一直寄望中國大陸能再度回到美國之戰略地圖（負起大地緣東端之責任），由於中共故意迴避，此希望始終未能達成。第二啓示是：台灣在此點上可以起一「觸媒」作用。茲試述如下：

第一，如要中共真正與美國站在一條陣線，二者在體制及價值觀念上必須有最低限度之共同點。如無之，則無異同床異夢。此所以今日唯西歐與日本方能是美國之盟邦也。

第二，要求得此共同點，美國必須設法讓中共在制度上有足夠的基本上之轉變。但其作法絕非由美國供給物質引誘（列根之「叛共」假定）所能生效。

台灣在中共資本主義化過程的「催化劑」作用

第三，台灣在促進中共作制度上改變，可起得一催化作用。原因其實很簡單。(a)中共要想與台灣「和平統一」，(b)中共領袖深知大陸情況相去台灣甚遠，(c)鄧派領袖已洞知非縮短與台灣在經濟上之差距不可。在「經濟學台灣」條件下，大陸勢必要讓私人企業及市場作用起到更大效果。唯有在經濟起飛以後，大陸在制度上才可能由「量變」產生「質變」，由經濟而滲流到政治領域（產生多元化），然後再倒灌到文化價值之領域。跡近於由民生而至民權，再至民族主義之過程。有這種質上之轉變，中國大陸才可能與美國達到最基本之共同點，才會真正回到美國戰略地圖上。

這種乍聽起來幾乎像傳奇般之發展，如果能發生，其先決條件乃是台灣這個觸媒之存在。故台灣海峽現狀之長久維持，不但會促使中共要爭氣（縮短經濟及各方面與台灣之差距），給大陸老百姓帶來福份，而且會給美國帶來福份。美國決策者如洞察此點，則當知如何處理所謂「台灣問題」。美國不但不應犧牲台灣來討好中共，而應幫助延長台灣海峽之現狀，俾讓台灣這一觸媒能繼續存在，並積極發揮其催化作用。換言之，美國在玩中共牌失敗之餘，應知玩這「台灣牌」之重要。唯有如此，才有希望看到中共制度蛻變，看到中國在自由康樂，及傳統文化價值回轉之條件下達到統一。唯有那樣，中國大陸才能整個回到自由世界，回到美國的戰略圖上。 ㊟

（轉載自台灣《夏潮論壇》二月號）

（原載：《大角鏡（港）》1986年162期58—60頁）

蔣經國打出「太子牌」

揭開蔣二公子「下西洋」之謎

□石 籟

蔣經國先生的次子蔣孝武，二月十七日突然獲指派為台灣駐新加坡商務辦事處副代表，他在中國廣播公司擔任總經理的職務於當天便由其心腹人物唐盼盼接掌，而十八日即火速趕抵新加坡履新，如此緊急的離任、赴任，整個過程被形容為「史無前例」，異乎尋常。難怪在台灣及海外，轉瞬間捲起好比千堆雪般的傳言。

把「二太子」逐出家門？

最初來自台灣的一項傳聞說，由於蔣經國發現蔣二公子在國民黨三中全會進入密鑼緊鼓期間，擅自插手，惹出不少是非，因此在盛怒之下一腳將之踢出家門。

不過，外界對此項傳言的可靠性深表懷疑，一般相信蔣孝武在歷經「江南事件」的教訓後，應不至於再闖大亂子，招惹老爸生氣，況且他的原職務又順利地由親信唐盼盼頂替，足見他在中廣的影響力並未失去，故此上述說法似乎立不住腳。

「文工會」下令各報刊不要評論、不要分析、不要暗示

另據台灣黨外雜誌《八十年代》報導，蔣二少爺履新消息發佈後，台灣各報均奉國民黨文工會或新聞局的「建議」，對這件消息不予評論、不予分析、不予暗示，各報一律採用官方中央社的新聞稿。事後唯

▼新加坡和中國往來日多，圖為李顯龍接受烏可力（中國國家副主席烏蘭夫之子，中國精密機械進出口公司副總經理）的禮品。



有民營的《自立晚報》刊出一篇專欄報導，後台強硬的台灣《聯合報》也係向文工會力爭後，才獲准刊登一篇分析文章。

《八十年代》的報導認為，把蔣孝武送離台灣，減少家族政治之類的疑慮，未嘗不是一項明智的決定。它說，古人有易子而教之習慣，蔣經國把自己的兒子交給李光耀，要蔣孝武跟李顯龍學學，也實在是一樁苦心。

實權將在胡圻之上

台灣現任駐新加坡商務辦事處代表胡圻將軍，現年七十歲，浙江人，軍校十期畢業，先後擔任軍團司令和裝甲司令，一九六〇年開始，擔任蔣家官邸侍衛長五年，他是看着蔣二少爺長大的。一九七四年他派駐巴拉圭當大使，「大使」下台後不久，即派駐新加坡。

在台灣，由於蔣孝武被送出國，不少政界人士都鬆了口氣。在一次聚會中，一位退休的老人說：「眼不見為淨」，有人則說「少在國內惹麻煩」。

蔣二公子今次就任新職，最惹人注目的現象之一，是幹嘛這麼匆忙？到底葫蘆裏賣什麼藥？由於時間上湊巧，外界自然地流出一項傳聞。

記得在蔣孝武飛抵新加坡前數日，中國國務委員谷牧，正巧在新加坡進行訪問，而且行程須到二月廿二日才結束，所以蔣二少爺趕赴星洲的時刻，有些敏感的人士會聯想到，將來蔣經國會不會透過蔣孝武，在新加坡與北京來人暗裏「三通」呢？

台灣知情人士說，李光耀父子近年來亦曾奔走於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其目的既在於招攬台海兩岸的生意，亦會趁便發揮溝通國、共兩黨的作用，以期降低海峽兩邊政府的敵意，促進雙方運用和平手段來解決有關統一問題的紛爭，俾可確保亞洲地區的繁榮安定。

按此推想，李氏父子心中確有藉機讓蔣二少爺在「無意之間撞見」北京政府代表的盤算。問題在於，觀察目前國、共兩黨關係的衍變，似乎尚未達致作出會晤安排的成熟階段，故而前項說法仍難令人信服。



► 蔣孝武

阻止新加坡與中共親近

若依常理判斷，蔣孝武席不暇暖地飛到星洲就職，除非身負重任之外，實在難有其他理由。因此，這樁「重任」由於時間上的巧合，有人臆測為可能與谷牧等中國官員見面，但也可得出另一種相反的結論。

最近較被各方接受的想法是，蔣孝武可能係親受老父耳提面命一番後，口啣最高當局的囑託火速趕到新加坡，以攔阻中國大陸官員在當地展開的經濟外交攻勢。尤其是谷牧在當時頻頻與新加坡簽訂合同，十足顯示北京政府意圖傾力協助新國渡過經濟困境，這種跡象的發展，不禁令台北當局焦急萬分，深恐台北的最後一座「外交堡壘」——新加坡，不久將又跟隨南韓前例，一步步落入中共的懷抱。

換句話說，蔣二少「下西洋」的重任之一係阻止中共透過經濟攻勢「屈服」新加坡。蔣經國先生有鑒於谷牧訪新之行，可能對台灣與星洲兩地的外交關係產生負面影響，才急忙忙拋出「太子牌」，一方面故意催促蔣孝武火速啟程俾吸引國際間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則迅速對外放出風聲，表明蔣孝武抵埗意在針對中共在東南亞各國展開的外交攻勢實施反擊，特別是防堵新加坡打起任何倒向中國大陸的念頭。

一般認為，這種推論似乎比較合乎繼亞銀會籍爭端後，國、共兩黨關係緊張程度升級所反映出來的現實。台灣在亞銀會籍問題上，迫於形勢之無奈而慘敗，如今絕不容坐視新加坡一併隨之「大江東去」。

蔣經國先生拋出的「太子牌」，估計應可對李光耀父子在心理上造成震撼，令他們感到過去多年的親密交情，不得不多為台灣的利益着想，壓下他們可能轉向承認中共的意圖，這的確是一手狠棋。

我們若從另一個角度觀察，蔣孝武出使新加坡（國府駐新加坡貿易副代表等同外交公使職銜），亦堪稱一項絕妙的安排。

取得超然地位，再圖出將入相

首先，蔣孝武移駕放洋，正好進一步落實蔣經國

先生在去年十二月「行憲紀念日」大會上，重申蔣氏家屬「不能也不會」參選下一任總統的諾言，消弭外界對蔣氏有意傳子的種種打擊，無形中紓解了蔣孝武動輒成為衆矢之的所擔負的壓力。

其次，讓蔣孝武在國民黨「三中全會」召開前遠離台灣，適可免去「太子」介入黨內派系鬥爭的困擾。同時，國民黨當局現下正積極從事黨、政、軍三方面人事的接班安排，蔣孝武擺脫是非之圈，不啻為自己爭得十分超然的地位。反正他早已深獲郝柏村等實權派軍人的擁護，未來在適當時機上也許會扮演平衡台灣內部勢力的角色，這種作用須得「後蔣經國時代」才可明顯看出端倪。

再者，蔣二公子過去在台灣一向涉足政治，毫無統理財經事務的經驗。如今他在新加坡實際主持國際「商務」，如此既可擴大國際視野、充實財經知識，又可增長外交歷練、改變過去的形象，大大提高其日後返台生根的行政資歷。蔣孝武出任此職實可謂受益無窮，很難說他將來不會「出將入相」，也很難說這不是蔣經國先生刻意安排的結果。

總之，即使蔣孝武抵新履職的去意對中共不善，然而，由於他個人身份的特殊條件，却又為中共帶來一個進行秘密外交的大好機會。

將來的一着伏棋

近年間，國際上盛傳新加坡一直是台灣與大陸之間的溝通橋樑，如前所述，李氏父子也樂於促成中國統一問題的和平解決。

生活在這種氣氛與背景下的蔣孝武，久而久之，心然會在耳濡目染之下，逐步擺脫台灣宣傳機構所灌輸的盲目反共思想，進而可能成為蔣經國與中國大陸最高當局進行秘密外交談判的最重要管道之一。換言之，蔣經國過去不方便向台灣黨、政、軍委員透露的一些想法或打算，如今皆可透過自己的兒子和外界交換意見，這當然包括可能與中共進行秘密和談的想法在內。而透露的對象首先必定是李光耀父子。由於新加坡內部保安工作非常上軌道，蔣經國與李光耀的剖心之論，應不致有外洩之虞。筆者相信，蔣孝武力足以擔當這項任務。

職是之故，蔣二公子「下西洋」的真正用意絕非尋常，它有可能是蔣經國為穩住李光耀，通過古俗「易子而教」的方式，免致新加坡外交政策轉向；也有可能是蔣、李兩人經過深思熟慮後所作的安排，讓蔣孝武日後扮演代傳蔣、鄧（小平）兩人信息的角色。孰是孰非，雖難一時遽下論斷，不過台灣倘若仍作困獸之鬥，將來未必阻止得了新加坡與中國大陸建交的轉變，倒是早日與鄧小平等人取得溝通，才是避免台海興起戰雲的睿智之舉。

（原載：《角鏡》（港）1986年162期16—17頁）

台灣黨內黨外 矛盾不斷升級

· 馬克 ·

最近幾個月來，台灣執政黨——國民黨與黨外，由於在“黨外公政會”組黨問題上意見分歧，矛盾漸趨尖銳化，鬥爭不斷升級，使台灣寶島瀰漫著一股暴戾之氣。目前，這股“暴戾之氣”不但沒有消散的跡象，反而越積越重，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黨內黨外劍拔弩張，“黨外公政會”理事長尤清揚言：如果國民黨不肯讓步，他們決定於今年八月正式成立“台灣民主進步黨”。如果矛盾繼續擴大，估計屆時必然另有一場政治風暴湧現。對此，台灣公衆無不感到憂慮，同時也引起國際人士的深切關注。

黨外積極醞釀組黨

台灣黨外論政團體林立，但當前最有代表性的是名叫“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簡稱“黨外公政會”）的黨外政團。“黨外公政會”成立於一九八四年五月。剛成立時只有二十三個會員，目前已發展到五十三名，其中七成以上是黨外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省市議員及其他公職人員。他們原先本為協調黨外之公共政策意見而組織，同時也參加地方競選，對執政黨只限於公共政策上的質詢。但後來隨著政經形勢的發展，他們與國民黨的鬥爭也逐步升級，圍繞著反對“戒嚴法”、反對“黨禁”、反對“三不”政策……團結組織羣衆，進行一系列的抗議活動。尤其是去年以來，台灣“流年不利”，發生了一系列政經風暴，“黨外公政會”就圍繞著“江南命案”、“十信弊案”、“李亞頻案”、毒玉米酒案、餛飩油案等一系列政

經案件，大揭執政黨瘡疤，大爆國民黨高官貪污、腐化等醜聞。他們出版、散發刊登有“內幕新聞”的刊物，組織黨外羣衆遊行示威，使國民黨大感困擾。

今年二月，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在大選中被科拉桑擊敗流亡海外，使菲律賓政局發生激變。菲律賓政局的急劇變化，激起了台灣社會的民主思潮，尤其使黨外反對派大受鼓舞，提昇了他們對組黨問題的濃厚興趣，他們遂計劃在原來“黨外公政會”的基礎上擴大勢力，在各地成立分會，以此作為“嘗試組織化的重要一步”，並揚言爭取在今年八月底以前組成正式政黨——“台灣民主進步黨”，以便在年底的地方大選中，與國民黨展開西方議會式的競選鬥爭。依據黨外人士的分析，黨外要正式成立政黨，必須趕在蔣經國總統健在時完成，如此方可避免政治流血事件。否則，在“後蔣經國時代”，如果台灣當局政策有變，將對黨外不利，那時就會失去組黨的“良機”云云。因此，組黨準備工作，便熱火朝天地在各地開展起來。黨內外矛盾也因此大為激化。

國民黨的“對策”

對於黨外人士的組黨要求，國民黨一貫的政策是：堅持“黨禁”，決不准許。內政部長吳伯雄在立法院正式表示，“黨外公政會”係一未經登記之非法團體，政府將依法取締。同時，行政院在回答立委諮詢時也強調指出：“為因應當前非常情勢，一切應以安定團結為主”，因此“決不能開放黨禁，組織新黨”。治安

警察機關已經接到上級命令，作好一切準備，只待政府一聲令下，立即行動，進行取締。不但如此，國民黨還指示各級黨部及有關單位，今後不能使用“黨外”字眼稱呼無黨籍人士；並指示：對無黨籍人士的稱呼，要針對不同情況（即根據他們對國民黨的態度），分別使用諸如：“社會公正人士”、“熱衷於政治的某某”、“偏激分子”、“別有居心人士”等，但一律不用“黨外”的字眼。對此，黨外人士表示嚴重不滿，他們認為，黨外人士用“黨外”名稱，天公地道，名副其實；“公政會”組織分會和黨外組黨都是憲法保障的人民的權利，法律上，國民黨沒有權力阻止他們。“黨外公政會”負責人尤清表示：在多元化社會裏，本來有許多不同意見，國民黨對於從事政治活動的不同政見人士，應抱寬容態度才行。他公開號召黨外：不要理會官方的恐嚇，要“一不做二不休”，繼續進行籌建各地“黨外公政會”分會的活動，必要時隨時準備宣佈成立政黨，“看看國民黨是不是真敢把我捕捉入獄去”。黨內黨外，劍拔弩張，空氣緊張到極點。社會人士的看法多數表示，國民黨不可能讓步，國民黨一定會抓人和採取取締的嚴厲措施。

但是，這種黨內黨外一觸即發的對立形勢，忽然由於一位“巨人”的表態而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為了緩和矛盾，五月七日，蔣經國以國民黨主席身份，在一次中央常務委員會的例會上，指示全黨“要把握基本方向與原則，在尊重法治的基礎上，加強各界人士的溝通，增進彼此了解……促進政治和諧，維護社會安定”。他同時委託總統府國策顧問陶百川等人，與黨外人士進行具體溝通的組織工作。

在陶百川和黨外人士——台大教授胡佛、楊國樞、李鴻禧等人聯合具名邀請下，國民黨方面的代表梁肅哉、黃光平和蕭天讚等三人，組成“三人溝通小組”，與黨外人士尤清（現任監委）、江鵬堅、謝長廷、黃希平（均為現任立委）、黨外知名人士張俊雄、康寧祥等八人，於五月十日進行了為時五個小時的“溝通餐敘”，並取得了三次突破性進展：一、雙方均表示承認台灣現行憲法；二、國民黨同意黨外設立“公政會”及其分會，但有關名稱及登記問題今後還將繼續磋商；三、雙方同意在溝通期間保持政治和諧。就這樣，國民黨對黨外

作出了讓步，黨外也爭取到組黨的合法權利，一時給人以一種輕鬆之感，籠罩在台灣上空的政治陰雲為之一掃。

行為失控，溝通觸礁

黨內黨外進行溝通，引起了強烈的反應：政治和諧的空氣剛出現，內外不滿、反對之聲再起。黨內一些元老派認為這樣的溝通，黨外太佔便宜，是“要五十給一百”，對黨外沒有必要這樣客氣；黨外激進派則認為，這樣快就與國民黨坐下來談判，是不堅持原則。對於名稱、登記之事更惹黨外反感。在此情況下，在第一次溝通中取得的成果，很快被破壞。在第一次溝通後不久，雙方都發生了“失控”行為：黨外人士於五月十九日發動“五一九綠色”運動，抗議國民黨繼續在台灣實施“戒嚴法”，成千黨外人士在龍華寺與警察對峙達十幾個小時，幸好沒有發生流血事件。與此同時，黨外人士、《蓬萊島》雜誌負責人陳水扁、黃天福、李逸洋等三人因“誹謗案”被判入獄。對此，雙方互相指責對方“沒有溝通誠意”，國民黨保守派主張決不能對黨外人士再行寬容，如有越軌，即行取締；黨外人士也指責國民黨此時搞溝通是“以退為進”，“以守為攻”，是“政治陷阱”，終於使第一次溝通的政治成果化為一紙空文，黨外宣佈取消原定於六月七日舉行的由黨外敬東的第三次“溝通餐敘會”，並於六月二、三兩日發動數千名羣衆靜坐示威和為陳水扁等人入獄舉行所謂“進監惜別會”，抗議國民黨對黨外的“殘酷迫害”，並公開宣佈台北市、高雄市等市“黨外公政會”分會的成立。“黨外公政會”台北分會理事會還提出一份“實施民主憲政時間表”：至遲在一九八七年黨外成立新黨；一九八八年解除戒嚴令；一九八九年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一九九〇年“總統”實行民選；一九九一年促進台海和平。黨外人士表示，這個時間表就是黨外政治鬥爭的目標，提出這個“綱領式”奮鬥目標，是為了促進執政的國民黨迅速解決各項政治問題。無疑，這是黨外針對國民黨保守派“高壓”而採取的針鋒相對的鬥爭策略，是黨外給執政黨下的“哀的美敦書”；至此，黨內外矛盾又再度激化，台北朝野剛剛出現的和緩空氣，又頓時變成滿天陰霾。

“海外黨外”遙相呼應

正當台灣黨內外矛盾再度深化之際，一個由聚居在紐約的“海外黨外人士”彭明敏、許信良、蔡同榮等一百一十四人發起的“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已經在台灣黨外的“台灣民主進步黨”成立之前，於五月一日在紐約正式宣告成立。該委員會在“成立聲明”中提出的主張有如下五點：一、總統由台灣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二、全體中央民意代表由台灣人民選出；三、廢除戒嚴令；四、釋放政治犯；五、廢除黨禁和報禁，保障言論自由。該委員會宣稱，其即將成立的“台灣民主黨”是“由民主運動的奉獻者所組織，只做黨外不敢做的事，突破國民黨的禁令，克服黨外組黨的障礙，打開民主的第一道門”。成立之後，還黨回台，“配合黨外的行動”。倘若“台灣民主黨”還台之後，黨外另有反對黨，國民黨政府開放黨禁，則“台灣民主黨”將自動改為台灣該反對黨海外支部。

從“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聲明，可以看出它的主張與台灣黨外公政會台北分會所提政綱頗為一致，因此被認為是台灣海外的“黨外”，但由於它在紐約成立，將對美國對台政策發生影響。因此，引起國民黨的特別關注，聲稱該委員會若干成員已列入通緝，若回台將依法逮捕，因此，台灣“黨外”也宣佈對它們“不歡迎”、“現在或將來均不會與他們聯繫”。不管台灣黨外與海外黨外之間有什麼矛盾，但是，他們之間的共同以執政黨為反對目標，以爭取廢除戒嚴令、總統直接選舉為奮鬥綱領，已足以使國民黨大傷腦筋。

美國自由派議員為“黨外”助威

更使國民黨政府傷腦筋的是正當台灣黨外的反抗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之際，在美國，由參、眾兩院議員愛德華·甘迺迪與史提芬·索拉茲為首的人士，在五月二十日在華府宣佈成立了“台灣民主促進委員會”。該會的聲明指出，該會是由各階層關心民主人士所組成，目的是促進台灣民主化，因為台灣的民主化將使美國在台的經濟和戰略利益獲得保障。該會委員、美國參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成員派爾甚至發出警告：台灣再次延阻民主政治的推行，可能

會嚴重損及美、台之間一向密切的關係。

一些政治觀察家分析，美國國會部分議員選在此刻組成“台灣民主促進委員會”，目的顯然在為美國未來對台政策的轉變預作鋪路工作。美國自由派著名學者兼政論家亞瑟·史萊辛格最近訪台返美後，在美報刊撰文指出，由於列根政府在政策上已偏向地緣政治而非意識形態的異同，白宮並沿襲尼克松——卡特時代加強與中共建立關係的政策，因此台灣的位置便如江河日下。

據報導，台灣黨外的政治動向和美國“台灣民主促進委員會”成立，已引起中共的極大關注，中共高層擔心黨外組黨將會影響“趁我們這一代人還在”的時候，解決中國統一問題的努力。由此可見台灣時局的發展，對海峽兩岸政治的影響，也因此必然引起國際的關注。

台灣面臨艱險處境

綜觀台灣內外形勢，台灣已面臨艱困的處境。在島內，它面臨黨外組黨的強大壓力。這壓力，由於菲律賓時局和南朝鮮時局發展的影響，激起黨外人士民主意識的提高而不斷加強，並且會向非理性發展，如果台灣政府在黨外壓力面前表現過於軟弱，將遭到黨內保守派的反對。反之，則又容易激起黨外的不滿，加上美國自由派議員在太平洋彼岸的推波助瀾和中共的“統戰”，將使台灣處於“三面夾攻”的境地。蔣經國最近採取緊急措施，進行一系列高層人士調動，想當與此一緊急形勢有關，“宜未雨而綢繆，勿臨渴而掘井”，蔣經國對這一步棋，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如果結合台灣內外情勢分析蔣經國最近一系列“開明”措施，蔣經國不愧是“睿智多謀”、“高瞻遠矚”的政治家。但是，今日海峽的形勢，除非“動大手術”，否則，潛伏的種種危機始終存在，台灣要徹底擺脫此種困境，談何容易！黨內黨外，如能互諒互讓，尚可奮發圖強，如果對抗繼續發展，一再失控，那最後只好由中共領導人警告的用武力來收拾殘局了。筆者為台灣憂。因為正如參與溝通的國民黨三人小組成員之一、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梁肅戎所說：“今日的台灣，不能有任何一絲動亂，這樣對所有人都沒有好處”。

※

（原載：華人月刊〔港〕1986年總61期47—49頁）